

谷辅林

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

谷辅林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

谷辅林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20 千字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600

书号 10099·1685 定价 0.95 元

目 录

第一章	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条件	1
第二章	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	60
第三章	沫若前期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	90
第四章	沫若前期的诗歌——《女神》	123
第五章	沫若前期的诗歌——《星空》《前茅》 与《瓶》	182
第六章	沫若前期的戏剧	251
第七章	沫若前期的小说	292
第八章	沫若前期的散文	324
后记		353

第一章 沫若前期思想 发展的条件

郭沫若作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以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其标志的。其实，早在北伐后期，他的立场、观点和政治态度，就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了。

郭沫若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当年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带，是比较闻名的富户。其母虽然贤慧，其父虽然勤劳，但是究其经济地位说，毕竟是一个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他的哥哥郭橙坞曾在四川省官界混过相当时候，并曾任过四川省交通部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成长起来的郭沫若，为什么既未为官，又未经商，也未务农，反而走上一条背叛自己家庭的道路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呢？这里有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引为借鉴的呢？这些，便是本章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并不是天生的。只不过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限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低下，为了摆脱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罢了。而剥削阶级之所以难于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关键在于这种主义本身直接危害着他们既得的优裕的经济和

政治的地位。所以，作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们，他们要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其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对本阶级的背叛。那确实是不容易的事，那是难度很大的一场思想斗争。郭沫若之所以能够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一、爱国主义思想的动力

郭沫若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郭沫若早在他的儿童时期，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中国的先进的知识界纷纷探求拯救祖国的道路，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等等著名爱国人士，曾经在郭沫若的思想里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当时对他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大哥郭橙坞。郭橙坞是四川搞启蒙运动比较早的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关系，当时的一些新书、新报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等，便由郭橙坞的采集而“象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①而他的大哥则又常给以启蒙教育，向他宣传要学习实业，“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②郭沫若后来追忆说：富国强兵的口号在当时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当时郭沫若读书的“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③正是在“富国强兵”口号的影响下，年幼的郭沫若便在他的内心深处，慢慢滋长出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情绪。他逐渐地为当时腐败的政治、落

后的教育、堕落的文明而悲愤。他对于人世间一些追逐名利、疾贤妒能的阴暗面产生了仇恨与反抗的思想。而他当时，作为一名学生，他所能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反对不平事，说说公道话，闹闹学潮，罢罢课而已。为了反抗，郭沫若受过记过处分，遭受过“斥退”。可贵的是，郭沫若始终不曾向封建恶势力屈服过，他不说一句软弱的话，不走一步妥协的路。他是决心反抗到底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反抗斗争，争取见到一线光明的天地。可是，他的希望只能是个肥皂泡沫，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未进入四川的省府——成都之前，他对成都是抱着一线希望的。他想，到了成都，一切或许会好起来。可是他到成都之后不久，便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成都并不比嘉定好多少。当时的成都正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④。成都的中学很多，官办的就有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此外，私立的中学还有不少。“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中学之外，还有一些法政学校，那是专为人们想当官而办的。郭沫若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⑥

一个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富强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祖国

政治如此之黑暗、腐败，祖国前途如此之渺茫，“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于是，年轻的郭沫若又走向了另一个苦闷的深坑，陷入了“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⑦

在他灰心、失望的当儿，唯一能够镇定他的情绪的是革命。年轻的郭沫若当时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反对、推翻清政府。因此，对当时思想界尖锐对立的两派，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朗。尽管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也很爱读，但是对他们的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郭沫若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是不赞成的。在郭沫若看来，中国当时之所以糟糕，其病根就是清政府的腐败。所以，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排满兴汉的政治主张他是拥护的。在他看来，“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⑧。因此主张排满兴汉的革命派人物，便在郭沫若辈的青年心目中，受到尊敬和崇拜。郭沫若说：“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⑨而且“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于是他们便开始在自己的周围进行寻找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们在教员里找，在学生里找，“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⑩，可是终于找不到。这是多么生动地描绘了郭沫若当时的心情！多么鲜明地表现了郭沫若当时的政治态度！一颗反封建、反异族统治的民主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心，是那样强烈地在跳动着。

为了祖国的富强，郭沫若是敢作敢为的。尽管他以前曾几次被学校处分，但是只要是大家责成或推选他办的事，他还是热心地去办的。在成都，他虽然是插班生，然而，一到推举代表为大家办事时，郭沫若便象是“终身大总统”似的，总是会当选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成都学生为了向政府请愿早开国会，以便早日实行君主立宪，曾闹过一次学潮。而在这次学潮中，郭沫若因是领袖人物，而遭到学校的“斥退”。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为了爱国，就必须反抗和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暂时的失败，当然是手无寸铁的弱者。然而，郭沫若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不但没有被压服，被摧垮，反而更加促使了他的反抗意志的最后形成，他决心要与旧社会不共戴天了。

然而，不用多久，清政府终于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垮台，四川省也宣告革命成功。这对郭沫若来说，是多么欣慰的事。郭沫若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在革命成功的当时，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①他们当时是迫不及待地先剪掉辫子。好象辫子一剪，中国就真的强胜了，就可以高呼“万岁！革命成功万岁”了。郭沫若的这种感觉已经历史地记载在他写的春节对联中。因为革命了，所以那一年春节，郭沫若大约编写了二三十副长联。其中他最得意的两副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观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⑫。

这两副对联不仅是郭沫若的，而且也是当时一般青少年的心理。浓重的民族感情，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极幼稚的自我陶醉！好象清政府一倒，共和的旗帜一举，中国便立地成了世界霸主一样，什么英、美、德、法、意、奥、日、俄，什么世界八大强国，好象统统可以不在话下了。

这种情绪虽然也表示着年轻的郭沫若有着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有着称雄世界的凌云壮志，但是那又是多么的天真烂漫和想入非非。

可是，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郭沫若很快地就由欣慰而变为失望了。因为他看到“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⑬。形式上虽称革命了，而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何尝成功过？中国“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⑭。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事例，足可以说明一切。辛亥革命的胜利，对人民群众来说是天大的喜事，人们怎能够不庆贺呢？可是新政权的统治者们是怎样庆祝这次胜利的呢？他们不是让人民生活得好些，而是把人民群众推向浩劫之中。四川都督府竟然丧心病狂地发布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赏三军，准许新旧的军士自由十天，不受军律的约束。这么一来，那些本来带着兽性的丘八们，

将如何地肆意放纵、为非作歹呢？可怜的“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当中真正成为了百鬼昼行的世界”^⑯。丘八们“在街上满凶横地摇摆着，开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闭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⑰。

这就是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景象！祖国依然在受难，人民依然在遭殃！四川的革命果实被新军阀尹昌衡抢去了。尹昌衡何许人？他是成都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进过日本士官学校，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后被袁世凯的四大金刚之一的赵尔巽调回四川办督练公所。辛亥革命、四川独立时，他正在担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他既有陆军小学的学生为他的爪牙，又有四川省陆军先辈的资格，于是在四川军界就颇有一点声望，“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⑱。由于有此种种原因，他便窃据了四川省都督的位置。

辛亥革命给人们的教训是：富国强兵的口号只是为少数人所利用的，有国者必富，有兵者必强。“甚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⑲而那位无兵都督蒲殿俊，尽管也登了基，可是仅仅十天工夫，却象泡在水里的泥菩萨一样，自动地垮了台。可见，手里没有兵的人，即便是获得政权，那也不能巩固政权。

面临着辛亥革命的悲剧，年轻的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

受到了严重压抑，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受到了极大的蹂躏，他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哀叹：“中国啊！你究竟该到哪儿去？”^⑯这句话虽是作者后来的回顾，但是是符合他的辛亥革命时代的心情的。

怎么办呢？年轻的郭沫若应该何去何从？他只一味的苦闷、不满。他对祖国的出路，个人的前途，一时间感到渺茫起来。“我差不多是甚么希望也没有了。”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我有一个唯一的希望便是离开四川。”可是，他那时经济还不能自立，怎么走得呢？于是他又自暴自弃起来，在拼命喝大曲酒、打麻将牌中，延续了一年半的时光。

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是年轻的郭沫若在爱国的道路上，在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征途中，遇到障碍之后而产生的一种消极的反抗。而其实，他的内心中正酝酿着一座火山般的热力，只待机而发了。

也是机缘应时而来，就在郭沫若进行消极反抗最为激烈的时候，就在他一心想离开四川而去寻觅光明和热力的时候，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各省招生，郭沫若作为四川的考生，居然被录取了。于是郭沫若可找到了离开家门的机缘，便在一九一三年七月离开家门而奔赴重庆，以准备去天津了。

其实，赴天津学军医，并不是郭沫若的自愿。他“不曾想过要靠医业来医人，也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糊口”，他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的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是京、

津、上海”。他之所以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其动机只在于借此机会离开四川而已，并不真心想去学医。所以到了天津之后，他便对学医问题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更加上青年自尊心、虚荣心的驱使，他感到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既没有象样的外国教习，又没有象样的中国名师。于是便自然地看轻了那座学校。这样，他就决定了此后的生活道路。

此后，他该干什么呢？老实说，那个时候连郭沫若自己也是很盲目的，他的大哥郭橙坞先生也是并不乐观的。然而，人的一生，常常由于偶然的机运，往往会走向自己不曾料到的方向去。在那严寒笼罩着的北京古城，在郭橙坞与郭沫若兄弟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把郭沫若一下子送到了日本，从而为他此后的一生，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

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为发展了。一九一五年，当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实际上是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郭沫若随同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曾经返回过祖国，表示过抗议。那次虽然仅仅回国三天，虽然于事无补，于国无助，然而，也足以显示出中国青年爱国的热忱。

也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为了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郭沫若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泰戈尔、惠特曼、歌德、斯宾诺沙等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都吸收着。但是就其政治思想上看，他当时属于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由于对祖国的爱，就千方百计地企求着祖国能有更生的希望。他终于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礼炮声中，感受到太阳的光和热。他的著名的诗集《女神》，便深深地反映和记载着他的爱国主义的高尚感情。为了爱国，他简直对十月革命产生了热烈的向往，他甚至希望中国也能象俄国那样建成“劳农专政”的国家。这就是说，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促使着郭沫若为了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从而导致他对十月革命，对“劳农专政”产生了憧憬和向往。所以说，郭沫若所以从革命民主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首要的因素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因为要爱国，所以他才会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憧憬之心。在这一点上，郭沫若同李大钊、鲁迅有相似之点。李大钊、鲁迅所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是首先从爱国这一点上开始迈步的。

二、客观形势的推动

客观形势的推动，是郭沫若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仅是他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者 的内在因素。内因之发生变化，还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解放前的若干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可以说都是为了爱国这个宗旨才建立起来的。至于如何把中国变得富强起来，那主张是不尽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有的主张走欧美式的路，有的主张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爱国者不必

一定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则一定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便是为了把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建成最美好、最幸福的社会，而在阶级严重对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则首先必须为人民而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所以，中国的一切共产党人，一切崇高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都有一个爱国主义的最初的觉悟的阶段。但是由于爱国主义者们所遇到的客观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其中一部分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另一部分则不一定成为共产主义者。那末，郭沫若在他前进的征途中遇到了怎样的客观条件呢？那就是五四运动、江浙战争、“五卅”惨案等一系列事件对他的影响和推动。

（一）五四运动的推动

无产阶级领导的、蓬勃发展的五四运动，是推动郭沫若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漫长时间里，郭沫若的思想一直处于苦闷阶段。在四川上学时的那几年是这样，到了日本后仍然是这样。在四川时曾经沦于烟酒赌博场中，在日本时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到过自杀。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死的诱惑》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嗳！

要得真正的解脱吓，
还是除非死！

死！

我要几时才能见你？
你譬比是我的情郎，
我譬比是个年轻的处子。
我心儿很想见你，
我心儿又有些怕你。

我心爱的死！

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

——《死》

一个爱国主义青年，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荡漾着火红的生命的热浪，他是多么希望祖国早日富强，人民早日安康！可是在腐朽无能的反动统治者的把持下，中国这只航船，长时间行驶于迷茫的黑夜中，行驶于无边无际的苦海里，这对爱国主义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烈的郭沫若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在家乡时，想远走异地；出了夔门后，又想飞去异邦；到了异邦，依然不能抹去心中那苦闷的阴影。于是，他就想到了自杀，想到了死。上面引证的诗，就是郭

沫若在五四运动之前思想情绪的生动写照。

就在郭沫若怎么也抹不去心中苦闷的阴影而想到自杀、想到死的时候，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暴发了。其势如山洪暴发，如狂飙骤起，古老的、黑暗的旧中国，犹如长眠的雄狮一样，突然甦醒转来，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这怎能不使年轻的郭沫若震聋发聩、欣喜若狂呢！于是，郭沫若便邀集了部分留日学生，自由联合组成了“夏社”。单单这一个“夏社”的名字，就浓厚地包含着郭沫若等爱国青年的赤子之心了。为什么叫“夏社”呢？因为是中国人（华夏）于夏天，在一个姓夏的同学家里举行的集会，所以郭沫若取名为“夏社”。这番寓意，恰同鲁迅后来为纪念瞿秋白同志而起的“诸夏怀霜社”的意思有相似之处。很明显，一个“夏社”，寓意着郭沫若等青年热烈的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是怎样地把一个企图自杀而未成的青年从死神的怀抱里抢救了出来，说明五四运动的狂涛巨浪是怎样地把一个青年的心进行了猛烈而痛快的冲洗！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郭沫若的思想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一个消极反抗的境界中摆脱出来，而变成为一个激进的、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了。他的诗集《女神》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作品，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崭新的时代特点的革命文学作品，最主要、最本质的因素，就是因为《女神》表现出了时代的、人民大众的呼声，表现出了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种内容上的崭新的时代精神，是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诗集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